

“天下很大，书房很小，可在学者眼里，书房就是天下。”最新出版的“北大学者书房”系列之二《第一等好事》，选取北京大学不同学科具有代表性的16位教师，走入他们的私人书房，去探寻学者书斋里的故事。



《第一等好事：北大学者书房第二辑》
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编
任羽中 主编
北京大学出版社



北大历史学系教授罗新： 记录历史和当下的写作场

□顾思程

坐落在朗润园深处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，是一座端雅的旧式四合院。一扇朱红门扉，掩住了草长深院，花落庭前，以及置身其中的学者的笔耕岁月。沿着花木中的曲径穿过四四方方的天井，

来到廊檐下一处长方形的小室。这里就是北大历史学系教授罗新日常读书和写作的空间。

三面书墙环绕两张桌案，书籍在书架每一级隔间中堆叠作内外两层。书海密不透风地遮掩下来，书房形同一间小小的船舱。安卧其中的古代汉籍、内亚文献、中

亚史书、突厥语辞典，滋养着书房主人贯通中外的视野和阐幽抉微的蕲向。它们记录着往古、当下的时空，因之渐染上一层幽邃与神秘；与之摩肩接踵的大宗文学作品，多为旅行纪实，文字映照出书斋之外的山河丛林、芳草郁金，有着不输于历史学的丰实和纵深，同样令人目眩神迷。不知是否出于对少年时代作家梦的追记，这位历史学者慷慨地为文学书籍留下足够的栖居之地。

经过二十年多年的广泛搜求、涓滴以汇，罗新当前的藏书已成超过一万册的规模。朗润园书斋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。很难想象1985年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时，两只木箱的承载是他仅有的存藏。从中文而历史，由南朝而北朝，再进入空间上更北的阿尔泰学领域，志趣的递嬗、学问的积淀演变为藏书内容的众体辐辏。尽管“拥书百城”是一种正面表达，但是一旦藏书将人的活动空间挤压殆尽，坐拥书城就会走向它的反面，变作一桩恼人的麻烦。对于罗新而言，这份苦恼大抵无从开解，因为藏书不易，散书更难。

书城高筑，插架琳琅，映衬出室中仅有的不置书籍的一隅，更令人眼前一亮：半面墙壁为一枚墓志拓片所掩，这是北魏郑羲所书亡母墓志，魏收在其中留下了他在《魏书》以外的文章；一幅工笔绘就的突厥贵女画像，画中人高履鲜衣，擎苍牵黄，别有一种夺目的英气；几张旅行图片，人物或凝眸远眺，或持笔作书，背景无一例外是广袤的草原。

这些时间中的标本，和旁侧用于夏季蒹葭的草帽、沙琪玛贴纸、卡通拼贴画柔和地共存，也与其学术考索、私人书写形成互文。书房盛满过去，它是通向远古世界深不见底的隧道，将中古中国的史书和文学，以及草原、荒野、说突厥语和蒙古语的游牧族群，一一收束而尽。书房的主人立于案前，翻阅密密麻麻的过去，体察历史演进的足迹，也将他所向往的远方写入纸间，由此我们看到了北魏皇帝的黑毡、金莲川上的风烟、阿姆河畔的月色、走出暗影的北魏女性……

书房是罗新记录历史和当下的写作场，在他的笔端，历史由远而近，当下不断隐入过往。

□顾思程 刘文欣

步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、夏晓虹夫妇家中的一刻，方知“书城”洵非虚言，而是对眼前光景恰如其分的描摹——书籍从墙角生长至天花板，又向沙发、五斗柜、壁橱、餐桌漫溢。主人陈平原简直“望书兴叹”，直言“书影响到了人的生活质量”，但又有几分无可奈何：“积习难改，以前喜欢书，现在还是喜欢书。”

陈平原自称“职业读书人”，他认为治学是志趣所钟，也是一种职业选择：“对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来说，读书当然是一种很值得嘉赏的行为，我呢，整天在读书，整天在写书，这就是我的饭碗，没什么好吹牛的。”

颇有些俏皮的话语中，可见陈平原一贯务实的作风。“读书人”的定位，也塑造了陈平原家中书房的风貌。与传统藏书家不同，对待书籍，他不务求珍本秘笈，无意炫博好奇。书房中不时上演的书籍聚散，也传达出“职业读书人”的眼光、理智与通达。

“其实，我们家的藏书我没有统计过。”不统计藏书，正是不以藏



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晓虹、陈平原： 累筑书城，可抵日月漫长

书规模为意，陈平原表示：“藏书规模大小，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关键在于，是否真正喜欢读书。”但他可以迅速说出到目前为止，他捐给家乡潮州的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的书籍数目：一百六十多箱。而且，这个捐书的过程还在继续，只是整理分类需要时间。管中

窥豹，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感叹“书占据人的生存空间”了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北京九城内外的各种书摊、书会、书店，常常可见陈平原骑自行车穿梭其中的身影。淘书、访书，是中文系学生大多会有过的经历。陈平原的妻子夏晓虹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

文系，两人发现因为专业相近，好多书买重复了。

同是近现代思想文化的研究者，陈平原不仅关注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，更将学术视野辐射向晚清民国的大学教育、都市文化乃至通俗画报；作为梁启超研究的大家，夏晓虹对近代思潮的追索横跨文史，更在晚清女性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一系列扎实绵密的成果，以独特视角再现晚清社会与思想的新变。

陈平原解释道：“做近现代研究的人，藏书往往是最复杂的。”近代中国，旧传统尚未消散，新思潮纷至沓来。华洋折冲，新旧会通，种种抵牾与断裂编织出那一时代的独特魅力，也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具备融贯古今、接续中外的宏阔视野与阅读积累，陈平原称之为“上挂下联”。“因为近现代本身和古代、国外的关系，我们需要收藏的面会比较广。”除了广泛掌握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基本资料，读书人必读的基本典籍，同样要纳入近代文史学者的书林。

真正的读书人，古今是不分的。没有说只读现代书，不读古代书。再加上传统的文史不分，藏书

芜杂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这种包罗万象、众体辐辏的百科式藏书固然是专业特色所致，但也与陈平原、夏晓虹二人重视史料与文献的学术取径不无关系。

“做文献的人锱铢必较，不肯放过断简零编。”对文献持久的兴味不可避免地造成藏书的纷乱，但在陈平原看来，这也是史家本色：“读经学出身和读史学出身不一样。经义会有自己的阅读理路，讲究不断推敲，但是史学要求广博，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参照系。资料、版本都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，所以家里的藏书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。”

说起夏晓虹对梁启超佚文的钩沉，陈平原都有些叹为观止：“夏老师每到一个地方访问，不管国内国外，首先看有没有梁启超的资料，她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。”二三十年的心中记挂，成就了皇皇三卷本的《饮冰室合集集外文》，也令夏晓虹的梁启超研究在海内外独树一帜。至今，陈平原在课堂上讲起鲁迅的小说史研究，总要提起鲁迅的那句“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”，十足的底气背后，是“书中日月长”的无尽工夫。

□钟润文

书对于赵冬梅老师来说，是不过时、不考虑钱，越积越多的存在。和其他物品不同，衣服会有不时髦的时候，如果一整年都没穿就可以扔掉了，但是书却不能因为一整年没看就扔掉。人文学科背景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，买其他东西可能会考虑钱，唯独买书不太会考虑钱的事情。赵老师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攒史料书，每次搬家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包书，她的每一本书都会随她而居。“书只能是越聚越多的。”赵老师看着满书架的书说道。

一间学者书房的形成，就是一本一本地攒，随着研究兴趣和走向的发展，这些书慢慢地成了系列，建了规模。看着书脊上暖黄的灯光，赵老师说：“一位学者积聚书的过程，其实也是学问增长的过程。”

但是，有聚就有散，只是散的



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： 一本书就是一条河流

方式各有不同。赵老师手里拿着一本纸页发黄的书慢慢摩挲，这是她的导师祝总斌先生留下的，

这是一种“散”的方式。历史学系的邓广铭先生把他的书捐给北大图书馆，书的寿命得到了延续，更

多的人从中受惠。所以，书在往前走的过程中，和时间结合在一起，从而有了故事，有了人，有了深度，它变成了一条河流。

对于学者来说，读书就是工作，此时的阅读效率极高。实际上，与其说是阅读，不如说是寻找。因为在研究的过程中，心里已经有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，所以读书的目标明确。此时，研究者身份的阅读奔向的是材料，在与材料交锋的过程中，一直在脑子里对其进行加工，并且随手摘抄。

赵老师将这种研究者式的阅读称为“干活”：“作为学者的阅读，我手上会拿着一支笔，随时要记，要不然就可能漏掉。有些文本，我手上没笔不能记录的时候，我干脆就不读它。”

而更多的阅读者是欣赏者，作为欣赏者的阅读，文学类书籍是首选。不管我们学习何种专业，文学绝对是滋养心灵的天地。读文学经典，要找到那些与自己心

性相合的作者和文字，寻找的过程，就是阅读积累的过程。

怎么判断是否相合？就是在此中我们能放开自己，感觉到舒坦和放松。结束忙碌劳累的工作之后，夜幕降临，面对桌上暖黄的台灯，翻开一本书，在那里安放白日的消耗与疲惫，避开周围的喧嚣与聒噪，沉淀自己。这便是与我们心性相合的文字带来的滋养，读得多了，慢慢就找到了。

赵老师用武术的说法来比喻这种阅读，即“返本归元”，当我们被外界拉扯、消耗得比较多的时候，一定要回来固守丹田之气；而回到内心的方法，就是回到书中。在书里，我们能安静地读下去，这便是滋养内心最好的办法，不必与外人分享，书里映照的是自己。

（本版文字摘自《第一等好事：北大学者书房第二辑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。图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提供）